

（二〇一八年九月十八日出版）

本期目录

【史海钩沉】	北大的“一打三反”与清查“五·一六”	张 从
【痛定思痛】	从我的心路历程反思清华党化教育	周志宏

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浏览，网址为：<http://museums.cnd.org/CR>。

【史海钩沉】

北大的“一打三反”与清查“五·一六”

· 张 从 ·

“一打三反”运动，是文化大革命期间、以1970年1月30日中共中央发出《中共中央关于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为开端，在全国掀起的一场政治运动，其内容是指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和反对铺张浪费。当时这个文件称为中央3号文件，但注明：此件只发到省、军级领导核心，以下各级均由省、军级派人口头传达，本件不再印发；更不许登报、广播、出文件。反对贪污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和反对铺张浪费的文件分别为5号和6号文件。运动的重心，在于“打”，即所谓“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

在当时“左”倾思想的指导下，在贯彻“公安六条”和许多地区一派掌权的情况下，这场运动制造了不少冤假错案，如蔡铁根、遇罗克（文革后平反昭雪并被追认为“革命烈士”）等人的无辜被害，以及1970年8月20日张志新以“现行反革命”罪名被判处无期徒刑。

据统计，到1970年11月底，全国共挖出了“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184万多名，批准逮捕各种分子28·48万多人，其中判处死刑的9000多人。还有大批虽未判死刑却被逼得走上自杀之路的人。如青海贵德县中14人自杀；上海市南汇县“造成非正常死亡62人”；宝山县“有250多人作为敌我矛盾处理，41人被迫自杀”；广西钦州地区“发生自杀事件238起，其中死亡188人”；“河池地区自杀169人”。

量刑时组织“革命群众”学习文件，讨论反革命分子该不该枪毙，算是执行“专政是群众的专政”政策。但通知上“最高指示”已说明“坚决地将一切反革命分子镇压下去”，列入名单者是“一批现行反革命分子”。要讨论的并非他们是否反革命，而是表态该不该枪毙。对反革命分子不表示革命义愤，“革命群众”也可以转化成“反革命”，所以谁都只有异口同声赞成“枪毙”。这些被量刑者的罪名有：“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为刘少奇鸣

冤叫屈”、“攻击江青同志”、“攻击省市首长”、“要求宗教活动”，牵强附会乃至捏造的莫须有，等等。

”现行反革命“在被枪决前，被分成小组，天天拖着脚镣、手铐，分别被带到各处的万人大会上斗争、示众。各单位欲把”一打三反“推向高潮，都要借用这批活靶子，以”教育群众“。

1970年3月间，湖南”长沙当局开了两次大的杀人大会，每次处决近100名犯人，其中一半以上是政治犯。“同年夏天，南京市分两批枪决”现行反革命分子“，每批24人（其中有两三名刑事犯）。为了避免政治犯乱呼口号造成恶劣政治影响，采取了麻绳勒喉管、竹筒塞嘴、”压舌板“、割喉管等”消声法“。密集公告的死刑判决上打红勾的名单，给人印象恐怖。云南罗平县运动中打死85人，还把圭山乡2分钟打死7人作为经验介绍。

在“一打三反”运动的同时，又开展了一场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集团”运动。

“文化大革命”期间，从中央机关到各地方机关，曾发生自上而下大规模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集团”运动。一时间，全国党政军机关、学校兴师动众，全力投入清查运动。成千上万的干部、学生被打成“五一六反革命分子”，遭到长期隔离审查、批斗、监督劳动，丧失人身自由，有的甚至被迫害致死。（360百科）

所谓“五·一六”反革命集团，是原北京一度存在的一个名为“首都五·一六红卫兵团”的人数很少的极左小组织。他们利用1967年5月“五·一六通知”在报刊上公开发表的机会，打着贯彻这一通知的旗号，建立秘密组织，进行秘密活动。散发题为“揪出二月黑风的总后台——周恩来”、“周恩来之流的要害是背叛五·一六通知”、“周恩来是毛泽东主义的可耻叛徒”等反动传单和标语，并将这些传单和标语张贴在北京一些繁华市区。（360百科）

据当时的北京“地派”领袖之一的聂树人回忆：炮打周恩来的急先锋是北京钢铁学院的张建旗，他是个干部子弟，早在1967年3月，他就在北京钢铁学院的形势讨论会上做了长篇发言，攻击“周恩来是毛主席的同路人”，“是第三司令部的人”，“执行了一条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在文化大革命中起了中央文革灭火器的作用，给中央文革开倒车”等等，当时遭到了钢院群众组织的批判，但他拒不认错，还公开发表声明，坚持炮打周恩来的立场，还在1967年5月底组织成立了《北京钢铁学院516兵团》。（聂树人：一打三反与抓五一六亲历记，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2014年）

据《天翻地覆慨尔慷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事记》记载，1967年6月14日，北京外国语学院“6·16兵团”头头刘令凯与张建旗一起在北京外国语学院策划成立了“首都红卫兵516兵团”，这个组织有一整套的组织机构，包括总、特务连、情报组、政治部、作战部、组织部、资料政策研究部，以及农林口、财贸口、文教口、工交口、军事口、外事口、中学、全国通讯联络站等8个方面军，并推选了各部负责人，制定了各个阶段的作战方案。7月中上旬，“516兵团”以财贸口和农林口为中心，开始了所谓第一战役和第二战役，散发了大量攻击周恩来的传单，8月9日，他们开展了所谓“八九战役”，在动物园、甘家口。西四一代大量散发传单，贴出反周大标语，还向外地邮寄传单。8月10日—11日中央文革召开大专院校红代会和中学红代会各群众组织座谈会，对反击“516兵团”作出具体部署。8月14日，“钢院延安公社”、“地院东方红公社”、“农大东方红公社”、“北师大井冈山兵团”等成立“专揪516兵团联络站”，下设农口、工交口、高

教口、中学口等分站。8月17日，“516兵团”组织部长李芳被钢院“延安公社”抓获，北外红旗大队查抄了北外“616红卫兵”总部，抄出大批黑材料。8月20日，张 Jian 旗被钢院延安公社捉拿，师大井冈山抓住了“516兵团”骨干分子陈立。8月26日，首都和外地1400多个组织的2万多人，在北京钢院召开“彻底砸烂反动组织516兵团大会”，张 Jian 旗等5名516头目在会上被批斗。到8月底，516兵团的全部成员都被抓，和这个组织也就覆灭了。

1967年9月8日毛泽东在《人民日报》发表的姚文元的《评陶铸的两本书》一文中加了一段话：“现在有一小撮反革命分子也采用了这个办法，他们用貌似极‘左’而实质极右的口号，刮起‘怀疑一切’的妖风，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挑拨离间，混水摸鱼，妄想动摇和分裂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达到其不可告人的罪恶目的，所谓‘五·一六’的组织者和操纵者，就是这样一个搞阴谋的反革命组织。应予以彻底揭露。”“这个反革命组织的目的是两个，一个是要破坏和分裂以我们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的领导；一个是要破坏和分裂无产阶级专政的主要支柱——伟大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他们的成员和领袖，大部分现在还不太清楚。”第一次公开在报刊上提出要在全国彻底揭露“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

林彪、江青一伙接过清查“五·一六”的口号，极力夸大这个反动小组织的力量和活动，任意扩大范围，千方百计地混淆和转移清查目标，以达到他们不可告人的目的。他们一方面大肆鼓吹查组织、追表格，强迫“坦白交待”，以制造扩大化；另一方面，又借机把许多反对“中央文革”、反对林彪、江青一伙的干部、群众打成“五·一六”分子。江青在1967年9月5日、1968年3月25日的讲话，把所谓“三指向”者定为“五·一六分子”，所谓“三指向”就是把矛头指向“无产阶级司令部”，指向“人民解放军”，指向“新生的革命委员会”，这就把打击目标扩大化了。有些地方或单位的两派组织乘机互相攻击、互指对方为“五·一六分子”；也有恢复工作的领导干部或军队支左人员，把他们认为是攻击周恩来、反对党中央、反对解放军的狂热极左派，当作“五·一六分子”加以打击。在所谓“红色恐怖”下，有的单位三分之一以上的人都被打成“五·一六”分子，甚至负责清查工作的专案人员也被咬成“五·一六分子”。大批干部和群众在身体和精神上遭到严重摧残。

1968年中央成立清查“五一六”专案领导小组，陈伯达（后被列为“五一六”阴谋集团的操纵者）任组长，公安部长李震（后因此事件自杀身亡）为办公室主任，谢富治、吴法宪为领导小组成员。

1970年1月3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在全国大规模地开展清查“五一六”运动。

1970年3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通知》。通知说：“国内外阶级敌人同我们的斗争是很复杂的，反革命秘密组织决不是只有一个‘五一六’”，鼓动人们去抓更多的“反革命”，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运动。

1970年10月，毛泽东作出批示：“‘五一六’问题不能一风吹，有些单位已经一风吹了，例如（北京）外语学院。”

1971年2月8日，经毛泽东批准，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建立‘五一六’专案联合小组的决定》。专案联合小组以吴德为组长，李震为副组长，组员有13人。《决定》指

出：在清查过程中“要防止扩大化，又不要一风吹”。此后，清查“五一六”分子的运动更加“深化”。

后来的发展更具有讽刺性，九届二中全会后，身为专案组长的陈伯达，竟被列为“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操纵者。“9·13”事件后，林彪被名列操纵者的首位。中央“五·一六”专案组办公室主任、公安部长李震也在公安部地下室自杀身亡。如此混乱不堪的“清查”，自然难以进行下去，只好不了了之。这种随意制造出来的“阶级斗争”，使数以百万计的干部和群众，经受了一场莫名其妙的痛苦和灾难。

这场清查运动一直持续到1974年批林批孔运动，之后不了了之。（360百科）

北京大学的“一打三反”和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是从1970年1月开始的。

据《北京大学纪事》记载：

1月，宣传队决定开展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运动，要求开展大揭发，大批判（极左思潮）、大清查（应该就是收到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的指示》之后）。

3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的通知》，要求各级党组织，各级革命委员会，在揪五一六分子时防止扩大化。宣传队领导小组做了传达。

7月25日，宣传队领导，校革委会发出关于召开批斗高云鹏大会的通知，号召深入开展“一打三反运动”。

7月27日，全校召开批斗高云鹏大会，揭发批判他在炸毁汉中汉运司大楼流血事件中的问题，在这次事件中，有18人死亡。会上，校革委会负责人宣布把高云鹏交由汉中地区人民批斗的决定。从今日起全校听课，集中时间，掀起大揭发、大批判、大检举和政策攻心高潮（7月30日恢复业余闹革命）。

在宣传队领导北大期间，有一个《简报》和《内部通讯》，记载了一打三反和清查五一六的情况。12月1日，第27期《简报》中“一打三反”统计，1969年7、8月份集中清队以后至今年2月份，“又清出叛徒、特务、地富反坏分子和贪污盗窃分子76人”。1970年12月3日《内部通讯》继是续刊登揭发批判“五一六”罪行的文章，主要内容批判聂元梓“野心家”言行，如：“三年文化革命白干了”、“17年掌权经验不能用了”，以及“上揪下扫”、“揪军内一小撮”等。《内部通讯》还刊登《关于一打三反运动的几个问题》，其中说：在对敌斗争问题上，有什么清什么，不论是政治的，还是经济的；不论是历史的，还是现行的；不论是“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还是其他反革命秘密组织，是什么组织就叫什么组织，是什么性质就是什么性质，不要一律叫“五一六”，好像除了“五一六”以外就没有别的反革命似的。在清查“五一六”问题上，不论在组织上加入了“五一六”，履行了组织手续，还是没有加入组织履行什么手续，他们的观点、立场、所干的罪行和“五一六”一样，就可以定性……”这就给扩大化制造了根据，意思是说有的人虽然组织上没有加入“五一六”，但观点、立场和“五一六”一样，就可以定为“五一六分子”。

1971年2月6日，学校召开了清查“五一六反革命阴谋集团”高潮动员大会，宣传队领导小组负责人王连龙做动员报告，强调主要清查“五一六”的罪行。

3月29日，校医院实习员姜肖管，在江西分校清查“五一六”运动中汇报了一些传闻，他所在连队找其个别谈话，并在群众会上不点名地对他进行“政策攻心”，姜感到压力很大，遂自刎身亡，时年33岁。

1971年3月，各连统计上报清查“五一六”被隔离人员已达26人，确定“重点攻心”对象为26人，共计52人。

6月9日，清查办《情况反映》：清查“五一六”运动以来，聂（元梓）线隔离审查对象共10人；牛线（井冈山牛辉林）隔离审查共7人。

6月18日，校党委会听取“五一六”专案汇报，汇报说：前段全校共审查52人，其中隔离审查25人（总校20人，江西分校5人）。会议认为，“五一六”是个反革命阴谋集团，组织要审查，但还是要搞罪行、幕后操纵者和主要骨干。关于处理问题，受蒙蔽的，交代了就算了；是骨干的，罪行不大，交代好的可不以“五一六”分子论处；骨干头头，可按态度决定戴帽或不戴帽。“五一六”分子时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有的可逮捕法办，有的该干什么干什么（指清查后），甚至可保留党籍。

12月4日，宣传队登记表统计，全校被确定为“五一六”分子的可疑对象共32人，不包括原校文革的聂元梓、孙蓬一等人。

12月25日，校党委会、校革委会常委扩大会议，通报：“一打三反”、清查“五一六”工作，到当时仍有专案审查对象117人。

1972年2月10日，校党委会听取“五一六”专案组关于专案的审查汇报，说全校“五一六”专案重点审查对象共117人。

5月31日校党委会开会，“五一六”清查办公室汇报说：北大文革期间参加“围困中南海”等9件重大反革命事件已基本查清，可定“五一六”主犯2人，从犯9人，现行反革命1人，打死人的凶手5人（有3人另做处理，1人暂不定），受蒙蔽的80人（其中考虑给一定处分的10人，在档案上记一笔的24人，另46人档案上不记了）。经审查排除16人，还有36人未查清。

10月18日校党委会开会，认定聂元梓、孙蓬一是犯了“五一六”罪行的首恶分子，提出暂不戴帽子、让群众监督、以观后效的处理意见；

10月19日，校党委会开会，同意对孙蓬一的审查结论和处理意见：从严处理，清除出党。

11月22日，校党委会、革委会常委开会讨论《北大、清华两校清查“五一六”工作的情况报告》，再次确定聂元梓、孙蓬一是敌我矛盾。

1973年2月21日，校党委会开会，讨论清查“五一六”的情况和处理意见。会议认为，经二年清查，北大九件重大事件及涉及的117人的问题已查清，其中认定为“五一六”反革命分子2人，胁从犯、有严重政治错误的13人，被蒙蔽、犯有政治错误的

14人，事出有因、查无实据、排除的16人，其他问题的72人。认定为反革命分子的聂元梓戴“五一六”反革命分子帽子，由群众监督，以观后效，报省级批准执行；认定为反革命分子的孙蓬一是助恶有据、民愤极大的从犯，决定戴帽子，劳动改造。

3月1日，校党委举行扩大会议，讨论聂元梓、孙蓬一的审查结论和处理意见。专案组汇报：对聂元梓从1970年11月开始审查，现基本查清。主要有五大罪行：（一）反对无产阶级司令部，主要从1967年开始就反对周总理；（二）反军乱军；（三）反对谢富治，反对市革委会；（四）策划武斗，残杀群众，怂恿凶手打死三名无辜青年学生；（五）破坏九大路线，反对党中央，在九届二中全会上追随林彪反党集团向党进攻。

汇报说，孙蓬一的主要罪行是：（一）反对无产阶级司令部，特别是反对周总理；（二）伙同聂元梓反谢富治，妄图颠覆市革委会；（三）挑动武斗，怂恿凶手打死三名青年学生，包庇凶手。

会议决定：同意给聂、孙戴上“五一六”反革命分子帽子，开除党籍，报市委批准后，全校召开大会进行批斗。

会上宣布清查“五一六”运动到此基本结束。

在清查“五一六”运动中，北大宣传队把已经毕业分配到外地的一些学生揪回学校，进行了清查，具体人数不清。根据一些校友的回忆，有下列几个：

北大物理系1966届学生，曾任聂元梓校文革动态组长的胡宗式，1968年被分配到了陕西宝鸡某工厂，在清查“五一六”运动中被揪回了学校接受审查，他回忆道：

1971年1月上中旬，我正和爱人度蜜月。在南京岳母家，接到厂里发来的催我回厂的电报。2月19日上午我回到厂里，知道北大来人了。当天晚上在厂保卫组，北大的李桂勋对我说：“北大有事让你回去一趟”。厂里派了干部科的吴长顺陪同李桂勋一起“护送”我上了当晚去北京的火车，21日凌晨2点左右到了北大。上午10点，我住进43楼211室，窗上钉了木条，门上贴的大标语是：“誓与5·16反革命集团血战到底！”。

物理系组成了20多人的专案组，成员有工军宣队队员、学员和教员，组长张万祥（原井冈山兵团），副组长庄逢源（原新北大公社）。1971年2月27日晚上9点多，系宣传队指导员杨宗佑（8341部队的连指导员）来到我住的屋里说：“你来了一个星期了，我们没有动你，是叫你安一下心。过去说我们掌握你70%，现在可以说掌握你100%。打开窗子说亮话吧，你是‘5·16’并且是骨干。是坦白呢，还是抗拒？从现在起和你进入短兵相接的阶段。你倒霉就倒霉在聂元梓身上，你知道她在5·16集团里处在什么地位吗？她不用填表，她有批准权。你以为材料烧了就查不出来吗？表烧了人还在。名册烧了，组织部长还在嘛！”接着又说：“你们搞的那一套不行，那是资产阶级的，我们是无产阶级的，资产阶级怎能抵得住无产阶级呢。我不要你现在表态，你先考虑一下，睡觉去吧。”

这一天晚上让我11点多睡觉了，比以前提前两个多小时。我多日缺觉，躺下就着了。专案组的刘文振（解放军学员、排长、学毛著积极分子）和另一个人一夜没睡，在旁边观察我是否辗转反侧。第二天早上5点多把我叫起来后，刘文振问我：“想得怎么样了？”我说：“不是！”一下子把刘文振气炸了：“啊！我们等你一夜，你可倒好，两个字完了。校领导说要把你培养成典型，给你机会你不要！”

1971年3月2日，宣传队在办公楼礼堂召开坦白大会。牛辉林上台坦白他参加“5·16”：“是洪涛发展我参加了5·16。我攻击江青同志，还发表反军演说，在王、关、戚的操纵下搞武斗。”牛辉林重点宣传不要搞攻守同盟，他说：“那是建立在私字

上的，是靠不住的。过去我把名单交给了洪涛，现在我把名单交给了工宣队。”散会后，专案组问我有什么想法。我说：“对立派的头头是5·16，我能有什么想法。”

1971年3月底的一天，由杨宗佑出面又找我谈话，他说：“这一个月没有动你，你别以为没事了。毛主席的政策一贯是一网打尽。这些天我们就做的这个工作。你是‘5·16’，你不是首恶，但你是骨干。一个也跑不了。你们是反王、关、戚的？你们反王、关、戚是个大阴谋。北大是毛主席抓的点，是个先进典型。它好在哪儿，好就好在稳准狠，一打一个准……”。下面是我和杨宗佑的一段对话。

杨：你怎么样？

我：“过去不是，现在不是，永远也不是。”

杨：“那么有人检举你呢？”

我：“可以对质嘛。”

杨：“对质？那么保护检举人的政策那里去了？”

我：“不对质，我没有别的法子。”

杨：“你还是好好考虑吧，为你个人的前途，也为你的家属。”

我：“这没有什么好考虑的。”

杨：“把话说绝了？”

我：“说绝了！”

杨：“那好，走着瞧。”一拍桌子就走了。

我当时错误地理解了“态度老实，不对抗群众”，一狠心就承认了“我是聂孙反党集团的骨干，但是我本人无阴谋。”因为我们是和5·16反革命集团作斗争的，是反对王、关、戚的。尽管我承认了“聂孙反党集团”，但在材料中，我一直把“5·16反革命集团”和“聂孙反党集团”分开来写，因为这根本不是一回事。

1971年9月9日、10日、11日连续三天召开全系大会批判我，地点是一教101。黑板上的标题是“彻底批判胡宗式的反革命罪行”。

事前规定我不许说话，不许喊口号，不许举手。他们先让我在门外等着，喊了一遍口号以后说：“把胡宗式带上来！”让我从后门（阶梯教室高处的门）进入。

9日批判我“反对无产阶级司令部”。

第一个发言的是一般而论，第二个发言批我“反江青”。当时我感到很奇怪，因为从来没有提到这个问题。他先泛泛地说5·16反革命集团如何如何仇恨江青同志，具体提到我的就是一件事：我说1968年3月8日，江青讲“你们为什么老是抓住王、关、戚不放呢，王、关、戚后面还有大的吗？”发言者说：“骗子给聂元梓黑指示，大反谢副总理，胡宗式却嫁祸于江青同志。”我听到这里笑了笑，把头一扭。第三个发言批判我反总理，说：“胡宗式勾结湖南某组织的坏头头炮制了所谓的007密令。”他还造谣说：“胡宗式拿到这份材料，对聂元梓说：‘刘少奇一类的政治骗子（指陈伯达）说这份材料很重要’。谈到‘与许维纲谈话记要’时，说这是‘以调查社会上反总理的情况为名，搜集整理总理的黑材料上报给黑后台。’”听到这里，我对他们的这种颠倒黑白、混淆是非的做法实在不能容忍，把头一扬，大声地说：“我从来没有反过总理！”这时全场一片口号，想以势压我。学员严谨宽跑上来，用手压我的头，压下去我抬起来，一共三次。主持人说：“把胡宗式带下去！”我把头一扬，昂首快步，穿过人群，从走道中过去。我步子大，后面跟着的两个人都是小跑。

10日召开的第二次大会，批我反军和挑动群众斗群众。

所谓反军，是在“聂元梓、胡宗式之流……”的名义下，把许多事都加在我的身上。他们造谣说我“反对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早在67年4月就说‘现在是军内造反派受压’。”他们还污蔑我“在电报大楼大反通讯兵”。散会时，他们总结了前一次会的经验，不叫我从后门出去，而是从前门走。这样不从人群中过，以免我示威。回来以后，专案组张万祥、庄逢源找我谈话。我批驳他们说：“说我在67年4月说‘现在是军内造反派受压’，我根本没讲过这样的话，即使讲了这话也不是错，那时受压的正是‘三军’。说我

‘在电报大楼反通讯兵’，这怎么可能呢？通讯兵在那支持‘红讯’，我们在那也支持‘红讯’。”

11日第三次批判我的大会，重点是反王、关、戚和二月逆流问题。

反对王力、关锋及其在基层的势力吴传启一伙，是聂元梓领导下北大的一次重大行动。当时这一伙人如日中天，反对他们有很大的风险。1967年4月10日聂元梓和孙蓬一到钓鱼台，面见江青和陈伯达（戚本禹也在场），告王力、关锋“结党营私，招降纳叛”。此次接见，江青讲了一句：“不是早就打过招呼了吗？要和吴传启在政治上划清界限。”针对这句话，大会的发言者说：“聂元梓造江青的谣。”又说：“你们反王、关、戚是搞政治赌博，靠的是先验论，是干扰毛主席的战略部署。”其实这些说法并不是创造，早在1967年就有了。因为不让我发言，所以我只能用肢体语言表示我的不屑。

1971年9月13日晚上，在办公楼的一个房间里，校领导找我谈话。参加这次谈话的有校领导三人、校专案组一人（他们都穿军装，姓名没有介绍），还有系专案组的张万祥、庄逢源。他们问我三次大会以后有什么想法。我说：“关于007密令问题，我拿到的这份材料，上面只写到刘志坚曾看过这份材料（密令），而我看到材料的时候，刘志坚已经倒台了，我怎么可能讲陈伯达说这份材料很重要呢？对这份材料，我当时已表态‘这是对总理的陷害’。”校领导说：“你不反总理？但是这材料是从戚本禹的办公室里抄出来的，签着你的大名，你还说什么？”我说：“我当时是上交中央文革的，而不是上交戚本禹的。如果说写明交戚本禹，那么尽管是在67年4月，也算我反总理！”“我把与许维纲的谈话写成材料，上报给总理和江青等首长，这怎么叫反总理呢？许维纲说：‘这一次你们北大站错了队，站在了总理的一边。’说得再明确不过了，怎么能推论出我们是反总理呢。”我又说：“在67年5月中旬，我到中南海对总理驻交通部的联络员讲‘我们发现了社会上一个反总理的集团，就是学部联队、师大井冈山等组成的团伙，每一次总理讲到余秋里、李先念、陈毅问题，他们都出来唱反调……’。这反映了我们对总理的态度。”

一位领导说：“说反谢就是反革命，你想不通，难道反谢是革命的？”听到这里我说：“那么我再讲一件事”。我讲了7月10日与学员周志强的对话，讲完之后，有一位插话：“你说‘我说了谢富治是5·16的总后台。’他说‘这还用你说？早就知道了。’是这样吗？”我回答：“是这样。这段对话，我以我的脑袋来保证，一个字不差。”他们问我：“你讲这些目的是什么？”我说：“为我自己作些辩解。”校专案组的人说：“今天校首长找你，机会很难得，你应当珍视，不要为自己做什么辩解。”首席校领导说：“今天找你还是要挽救你。你的态度很不好，在北大是出奇的，在北京市是少有的。三天大会我们都参加了，坐在后面，你看你的样子，听说你在学生时代就高傲自大，目空一切。但是我们还要按照党的政策，挽救可以挽救的人，你还很年轻，才30多岁，还可以为人民做点事。你自己也要为你的前途着想，要考虑一下到底走什么路，是否要和5·16反革命集团彻底划清界线。”我没吭声，停了一会儿他又说：“我们也不要你马上回答，回去以后好好地想一下。”

事后，庄逢源要我把与周志强的对话写成材料，并叮嘱材料只能交给他和张万祥。

1973年3月30日晚，我在全系大会上向群众作检查。我检查之后三位群众（学员谢东升和教员卫崇德、刘尊孝）分别发言，然后由系总支第一副书记曹芝圃宣布结论：“对胡宗式的审查结束了。今天他向群众作了检查，我们认为这个检查还是很不深刻的，但是也看到认识有了提高。根据党的给出路的政策，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组织上认为，胡宗式是受聂元梓蒙蔽，犯政治错误。不予处分，不记档案，不作书面结论。”

张万祥和庄逢源送我回厂，1973年4月6日回到厂里，他们把我交给了厂干部部的赵念书。当着我的面，他们向厂领导谈了对我的结论，并说：“以前你们怎么对待，现在还怎么对待。”（胡宗式：重回北大的日子，《风雨未名湖》，中国传记出版社，2018年出版）

国际政治系65级的屈长江（曾是北大红旗飘的成员）回忆说：

记得1971年初春，已经毕业的我又被揪回北大，这一回的罪名是“五一六”分子。我当时对系里八三四一部队的领导人说：“我们的事不是已经平反了吗？我和王忠林还找过迟群同志，问以后再搞运动整我们怎么办？迟群拍着胸脯承诺：十年之内，有人整你们，让他来找我！”领导说：“那次是那次的政策，这次是这次的政策。”弄得我莫名其妙，哑口无言。

大约一两个月以后，我被叫到校八三四一部队某个办公室里去训话。训话者是位女同志，三十来岁，军装，短发，不认识是谁。训话的神态，口气，总让我想到传说中的谢静宜。训话的情形大致如下。

首先，她问我交代得怎么样了。我说，过去交代过的，又交代了一遍。她听了后怒斥道，这次要交代新问题，就是参加“五一六”的问题。我说，我不记得有此事。她说，我们是八三四一，你应该了解的。你不是“五一六”我们会把你大老远的弄来吗？！我们有实打实的把握和证据。我们每天都向毛主席汇报工作的。你要准备一份坦白交代大会上的发言。记不记得没关系，以后有的是时间慢慢回忆交代。先坦白交代参加“五一六”组织的事。我们的政策，你是知道的，不用我再多说了吧？！

我能怀疑曾经为自己平过反的八三四一中央警卫团吗？我能怀疑这位可能是谢静宜的女领导每天都向毛主席汇报情况吗？我只能怀疑我自己早已被几次隔离审查弄坏了的记忆力和脑袋了。

于是，开大会那天，牛辉林上台坦白交代完以后，我就走向了会场的讲台。半路上转头一看，分布在会场各个角落的“同伙”纷纷起立要求坦白交代。怎么又是我！第一个把自己绑在背叛良知和道德的耻辱柱上，让我悔恨一辈子！

我中了“忠诚”和“信任”的圈套！

大约七八个月后，八三四一部队的王连龙政委笑嘻嘻地来到我的隔离室，问我最近过得怎么样？我说：“八三四一也搞逼供信！我没有参加过‘五一六’。我记起来了，我参加的是《红旗飘》的红卫兵。”王政委嘿然不悦，脸拉得长长的，走了。

自从1971年，我又一次被八三四一揪回北大隔离审查八个月，然后又不了了之的放回乡下后，我就开始重复性的做一个噩梦：我又被抓回北京大学了，我们又被定什么罪名了，这个噩梦从我二十多岁一直做到五六十岁。最初，梦境清晰而紧张，几乎每月一次。随着岁月的推移，渐渐地，噩梦的紧张度淡化了，弱化了，间隔的时间长了，但依然辨得出它的基本特征：在北京。在北大校园。在被囚禁的28楼。还是那几个人。它几乎伴随了我一辈子！（屈长江：良知漫漶的岁月，《燕园风云录》，2016年8月）

曾当过北大井冈山兵团勤务组长的牛辉林，毕业后分配到山西定襄县神山公社当干部，1970年10月就被押回北大再次审查。

他的回忆比较简单：好景不长，5月到公社报到，10月北大又派人把我从神山押回。这次关押整整两年时间，直到1972年北大又派人把我放回神山。头一年的前半年多是在搞什么连校方也莫名其妙的“516专案”，下半年“516”莫名其妙地不说了，又拿起“议论无产阶级司令部”旧事重提。到了1971年“九一三”林彪事件后，专案停止，发配到学校后勤修管道、烧锅炉。1972年夏天后勤劳动结束，校方给了一个“议论损伤无产阶级司令部”、“严重错误”的结论，就要打发我回山西。我坚决不肯签字。负责专案的8341部队魏银秋教导员谈不行，校党委一把手王连龙副政委谈也不行。拖到九月，早已回中南海工作的杨德中政委回北大亲自谈，最终商量了一个结论中写上“保留（共青团）的折中办法，我才勉强签了字。“十一”后得以重返神山公社。…1979年北大召开全校大会，为包括我在内的100多名学生平反。北大党委《平反决定》明确指出，1970年叫我回校审查时错误的，予以改正，撤销原结论。（牛辉林：故园四十二年前——从北大到神山的故事，《告别未名湖》第2集，九州出版社，2014年）

在清查“五一六”运动的中，还有一个冤魂，在《北京大学纪事》没有记载，就是汉中分校的助教周善丰。在王友琴统计的北大文革非正常死亡的63人名单里记载着：周善丰，28岁，男，助教，汉中分校，共青团员，1973年5月12日，自刎。（王友琴，六十三名受难者和北京大学文革，原载《二十一世纪》双月刊，总第九十三期）。

他的同年级同学丁向阳回忆说：

1970年3月毕业时，周善丰被分配留校工作，按说毕业能分配留校是很不错的去向。当时力学系在汉中653分校，他也就留在了汉中。他进了力学系的流体力学教研室。一边由老教师帮着补一些文革中落下的专业课，一边给新进学校的工农兵学员补基础课，日子过得还算安稳的。但好景不长，北大是个是非之地，1973年文革的风暴还是刮个不停。在清查“五·一六”的运动中，尽管汉中相比北京运动的烈度并不算太大，但北京的风暴还是刮到了汉中653分校，三月份653分校播放了北大在北京批斗所谓“五·一六”份子的录音，迟群和北大校党委给聂元梓、孙蓬一戴上了“五·一六”反革命分子的帽子并开除党籍。周善丰听了以后震动很大，惶恐不安。当时我们班其他留校的同学很关心他、和他谈心，让他放下思想包袱，不要紧张，后来那位同学出差外地两个多月就没有机会再和他沟通了。周善丰脆弱的神经在当时的情况下有点绷不住了，整天疑神疑鬼地以为别人要整自己。1973年5月12日中午，他的精神终于崩溃了，拿起小刀割了自己的脖子。当他把气管割破、血流了一地，血流出了门外才被其他老师发现，喊人帮忙急救，周善丰因为气管破了，痛苦万分。由于汉中分校医务所的条件太差，护士只是把他的伤口稍微处理了一下，插上了一小根管子暂时维持生命，然后用一辆汽车把他往30公里外的汉中县医院送，送到县医院时那根插在气管里的管子在路上被颠掉了，周善丰已经气绝身亡，永远离开了人世。（丁向阳：王建新和周善丰是文化革命牺牲品，《风雨未名湖》，中国传记出版社，2018年出版）

总起来看，“一打三反”和清查“五一六”集团运动，是“清理阶级队伍”运动的继续，是在阶级斗争理论和极左路线指导下制造的人为的政治斗争，制造了大量的冤假错案。北大的这一运动从1970年持续到1973年，完全是按照中央的布置进行的，是有组织、有步骤的，不仅在总校搞，在江西和汉中两个分校也搞，而且把部分已经毕业的学生又揪回学校审查，还给一些怀疑对象所在的单位发了函，致使这些毕业生在所在单位挨整。被列为专案审查的对象达到100多人，2人被逼自杀身亡，最后仅把聂元梓、孙蓬一二人定为“反革命五一六分子”。事实证明，北大没有一个所谓“五一六分子”，聂、孙虽然在文革中犯下了严重的罪行，但是他们也不是什么“五一六分子”，所以这场看起来轰轰烈烈的运动，实际上是一种“无中生有”的或“莫须有”的运动，不仅浪费了大量的时间和人力、物力，而且给100多个审查对象及其家庭带来严重伤害。

~~~~~

## 【痛定思痛】

从我的心路历程反思清华党化教育

• 周志宏 •

◇ 前面的话

1963年初秋，我怀着对未来的美好憧憬，踏进了“美丽的清华园——红色工程师的摇篮”。在这个新的天地，感受到完全不同于中学时代的浓厚的政治氛围。

时年17岁的我，不乏单纯真诚，带着对乌托邦的虔诚和热忱。但又肤浅幼稚。

我家庭出身非红五类，父亲从小家境贫寒，学徒出身，凭诚信的品德艰苦奋斗几十年，解放前任常州同福布店经理（股金900元，为总股金二十分之一）。我是带了出生于资产阶级家庭的原罪，开始大学生活的。

1957年，父亲在我11岁时病逝，父亲生前留给童年的我的印象，是慈祥、辛劳、多病（父亲有时咳嗽厉害，咳不出痰来，我在旁曾有恨不能身代之感。）在我的孩提时代乃至中学六年，从没有想到要批判父亲。1961年高二入团时，我印象中团组织也没有提到此事。

大学期间的思想教育态势，十分凌厉和深刻。做思想工作的，除了班主任，还有政治辅导员，政治老师，学生党团干部。课余不断参加各种大小会议和活动。

从参观校史展览（反右）批判“成名成家”的个人主义，到政治课学习讨论“又红又专”，以及后来的“九评”学习，还有下乡劳动，下连当兵等各种活动接连不断。

刚入学时要求加强思想改造，清除个人主义的影响，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后来则强调“不忘阶级斗争”、“反修防修”、“背叛家庭”、“做革命接班人”。这些政治教育使我内心受到很大的冲击，思想发生深刻的改变。要追求进步，争取入党，势必要与家庭划清界限，因父亲早逝，批判有些抽象，空洞，不乏概念化的，贴标签式的批判。

## 一、回顾1963—1968年的史实

1、一份1964年思想汇报摘录：“……对于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的我来说，更应该加强自我改造，和家庭划清界限，背叛这个阶级，才能在任何风浪里站得稳，顶得住，永远跟党走，才能在阶级斗争的前列，担起革命和建设两副重担，做一个坚强的共产主义接班人。因此我必须比较全面地回顾一下自己从小以来所受家庭的影响。记得我小时候，父母灌输给我的是一种封建式的报答思想，说‘长大后要挣钱孝敬父母’。当时在我幼小的心灵中留下了影响。在我小学毕业时（11岁），父亲因病去世。这时我好几位哥哥已相继参加了工作，家庭经济生活完全由哥哥们负担。我进初中后，心中不由浮起这种想法，觉得应该认真学习，否则对不起母亲和哥哥们。”

2、一份1965年思想汇报摘录：“……刚接到录取通知书时，我心中想的是如何刻苦努力学习，将来能成为一个工程师。来校后我在第一堂政治课上听到了我们要接两个班，一个是革命的班，一个是建设的班。我们要做革命事业接班人。时代赋予我们伟大的使命是高举革命大旗，将革命进行到底。不仅要在我国实现共产主义，还要在全世界实现共产主义。现在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遭受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残酷剥削和压迫，他们多么渴望能够获得解放，他们今天的处境就正是中国人民在旧社会的处境，我们现在已经获得解放，但还有许多阶级兄弟没有获得解放，我们怎能产生不革命的想法呢？作为新中国的青年，第一条就是要担起革命的重任。是口头上将就算了吗？不行，要有实际行动。在学校里，我们当然不能立即就参加支援亚非拉地区的革命和建设，但我们应该在学校里为将来参加革命创造条件。例如加强思想改造，清除个人主义的影响，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等等。”

“在参观了反右斗争展览后，受到了很大的启发。认识到个人主义是万恶之渊，政治上的反动与思想上的落后没有截然的界限。个人主义发展的结果就会导致政治上的反动，这是要引起警惕的。”

“资产阶级思想通过各种渠道在腐蚀我们青年，尤其是生活的孔道，贪图安逸，害怕艰苦，厌烦火热的斗争，希望过舒适安逸的生活等，也就是不要革命，只要享受。帝国主义和国内外反动派把希望寄托在我国第三代第四代身上，把社会主义和平演变到资本主义。苏联的教训是十分沉痛的，我们决不能让历史的车轮倒退。这就需要我们时刻警惕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来观察、分析、处理所遇到的各种问题，根据是否符合无产阶级利益来决定取舍。这样我们在阶级斗争的大风大浪里，就能够顶得住，站得稳，看得清，不至于迷失方向。毛泽东思想是我们行动的指南，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自己的头脑，我们就不怕任何风浪的考验，就能够战胜一切敌人。”

“进大学后通过党史课学习，下连当兵，下乡劳动，特别是上学期进行的‘九评’学习，我感到自己的阶级观念增强了，能够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去看一些问题，解决一些问题。以前我对家庭的认识是很不够的。由于父亲去世较早（在我11岁时因病去世），在我头脑中父亲的情况知道比较少。又听母亲讲，父亲过去是如何辛辛苦苦勤劳了一辈子，才从一个小摊到后来的一片布店。因此我对父亲的印象是好的。没想到恨，还惋惜他死得太早。剥削和劳动的界限在我思想中是很模糊的。去年暑假我到上庄人民公社进行了访贫问苦，了解到一位替地主富农干了二十多年的贫农老大爷的惨痛身世，我受到很大启发。他成年累月干活，到头来还是吃不饱、穿不暖，解放时仍然上无片瓦、下无寸地，三十七岁还打光棍。是地主富农的剥削，他用血汗养肥了那些吸血鬼。从老大爷的亲身经历中我联想到自己的家庭，父亲决不是靠勤俭起家的，实际上世界上没有靠勤俭起家的资本家，在那种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的社会里，要么就像刚才讲的老大爷那样，做牛做马受剥削，要么就是占有别人的劳动成果，剥削别人，把自己的舒适生活建筑在使劳动人民受冻挨饿的基础上，搞清了这个道理后，对父亲的看法有了改变，也想到要与家庭划清界限了。父亲虽然开的店不大，在店中的投资也不多，拿的定息每季度只有十几元，但他的剥削本质是不变的，资金的多少，商店的大小仅仅说明剥削程度的不同而已。（母亲对于家庭成分的划分很有意见，她认为父亲所开的店是由十几人投资合办的，父亲投资只有近千元资金，也算是资产阶级，而店内有几万、几十万的也是资产阶级。）”

“世界上从来没有所谓‘勤俭起家’的剥削阶级，资本家剥削工人的方式程度可能各不一样，但本质都是剥削。有的资本家确实表面上装出一付‘勤俭’的假象，但其目的不过是为了积累更多的资金去剥削更多的工人，并且以此来迷惑工人，使工人卖力为他们创造财富。他待人‘仁慈’也是有目的的，例如对职员态度等表面上一团和气，并不凶狠，实际上是想使别人更多地为他服务，以榨取更多的剩余价值。解放前夕，有很多工厂商店倒闭了，而父亲的店却能支撑下来，这与他一套手法也有很大关系。一个资本家，不管其外表多么老实，和善，决不会改变他唯利是图、贪得无厌、投机取巧、损人利己的阶级本性。特别是像父亲这样从店员爬到经理位子上的资本家，他的发家过程，就是一个欺诈剥削的过程，这个过程完全揭露了什么‘勤俭’、‘老实’等等伪善面目。”

3、1966年6月文化革命开始，“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大破大立”，“灵魂深处闹革命”，“狠斗私字一闪念”，“与传统观念彻底决裂”，“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做人民的儿子”……在这种大背景下，我对母亲说“我不是你的儿子”，自以为是在无产阶级立场上与家庭划清界限。

我是母亲最小的儿子，在她心中是有出息的、值得骄傲的儿子，父亲去世后，母亲曾多次对邻居说，把我这最小的儿子抚养成人，就尽到责任了。现在我说出这样的话，对慈母精神上的打击，可想而知。母亲当时迷茫的眼神，痛苦的表情，讷讷的话语，我至今记忆犹新，一年后慈母病逝，我永远失去了认错的机会，令我痛悔一生。

#### 4、对父亲留下的家训《家言》一文横加批判。

##### 1.《家言》封面

批语：对这株大毒草用毛泽东思想作为武器进行彻底的批判！！！1966·9

2.家言：人生自母胎产生以后，渺渺无知，受父母之抚养，渐渐长大成人。故为人要知道如何的成人，及如何的做人。

批语：在阶级社会中，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

3.家言：父母亦是苦寒出身，经营商业已历三十余年，其他一无所获，惟你兄弟七人，即是积蓄。数十年之过程，含辛茹苦，惟得一家温饱。

批语：剥削了别人的劳动成果。

4.家言：现春、元二儿学龄将满，正谋导入社会，以求自立谋生，创造伟业，以光门庭。此是为父之期望，将来一旦成就，皆为父母所赐，所以父母之恩，永世难忘。如父母不能抚养儿女成人，是父母之过，儿子长大不能成事业，是儿子之不孝。

批语一：忠孝不能两全，共产主义与封建主义的道德不能合二为一。

批语二：如果是穷人的话，就不是父母之过，是罪恶的旧制度。

5.家言：兄弟手足，父母骨肉，将来汝等兄弟之间，应相互助，相敬爱，兄若富有，不可忘弟，弟若得志，不可弃兄。且兄须爱其弟，弟必敬其兄，勿以纤毫事，而伤骨肉情。父但愿你们兄弟七人，长抱为父之志，而多能成器，勿有一个废人，大家共策共力，同甘共苦，创造伟大事业，造福人群社会。

批语一：要有阶级观点，阶级社会中，人与人之间首先是阶级关系，而不是亲族关系。

批语二：什么伟大事业？光宗耀祖乎？

6.家言：己身是父母之血肉，后天抚养费莫大心机，原本希望长大成人，为国家社会效劳。有无知之人，不自爱惜，将父母之血肉，不自保重，如有意外，你想岂不愧对父母，所以卫身是最最重要的事，对于日常的饮食起居宜自当心。

批语：活命哲学。

7.家言：为人作事与自己作事，务必信义，忠诚，勿可虚伪。处处须为人着想，勿自私，事以正当之业，勿损人利己，终身要奉公守法，以身作则。物资原为身外之物，我们惟求生活安定，只谋求正当利益，勿事积财，遗（贻）害子孙。勿存贪污之心，自堕人格。

批语：何谓正当利益？剥削乎？剥削乃最大的自私。

## 二、分析与反思

### 1、现在看，大学期间接受的思想教育，有许多需要重新认识，予以否定。

例如，反右，已经被实践证明是完全错误的。1957年毛泽东用“引蛇出洞”的手法，诱使一大批热血青年和忠诚有识之士，帮党整风，后来都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分子。使中华大地失去一大批精英。有数百万人受到株连或处分，许多人在后来的强迫劳动和大饥荒中失去了生命。现在看，当时提的意见并没有错，最“恶毒”的右派言论，无非是“党天下”，希望成立“政治设计院”、“平反委员会”，六十年过去了，现在不还是到处强调什么都“姓党”吗？当年批判钱伟长“理工合校”，后来不都合了吗？当年有人依据事实讲了抗战胜利后苏军在东北的罪行，被打成右派，两年后，中共不也与苏共分道扬镳了吗？……迄今为止官方只承认为扩大化，是不能自圆其说的遁词。99%以上的人都打错

了，还硬说是扩大化，如何服人？哪有“实事求是”的半点影子？1977年邓小平曾多次标榜“‘实事求是’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精髓”，等他复出坐稳后，就把“实事求是”这个精髓忘了。

还有当年被灌输“当革命接班人”的思想，一个当时流传很广、未经证实的《语录》曾深深激励我年轻的心：“今后的几十年，对祖国的前途和人类的命运是个多么宝贵而重要的时期！现在二十岁的青年，再过二三十年是四五十岁的人。这一代青年人，将亲手把我们一穷二白的祖国建设成为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将亲手参加埋葬帝国主义的战斗，任重道远。有志气有抱负的中国青年，一定要为完成我们伟大的历史使命而奋斗终身。”现在五十多年过去了，“将亲手参加埋葬帝国主义的战斗”，成了一句梦呓，而苏联、东欧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却纷纷解体。成了鲜明的对照。当中国人尚在吃不饱、穿不暖时，甚至在三年困难时期，饿死了数千万人，却说什么“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高喊要“解放全世界的劳苦大众”。高喊着“我们是共产主义接班人”，却不知道“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更不是共产主义！

“九评”学习，是在校当年十分凌厉的思想教育活动，但“九评苏共中央公开信”本身，已经被邓小平称为“当年我们双方都说了许多空话”（与戈尔巴乔夫谈话1989年5月5日）。文章中批判苏联和南斯拉夫变修的事例，远不及我们的现状，也就是说，我们变修变得更厉害更严重。而“九评”中提出的培养革命接班人的五项标准，也成了绝妙的讽刺。为了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毛泽东打倒了“中国赫鲁晓夫”刘少奇，选林彪作为接班人，并写进党章。没想到自己亲自选定的接班人，两年后居然“造反”、与自己分道扬镳，沉沙折戟于温都尔汗。后来又选了不成气候的王洪文，也是历史上匆匆来去的过客。终究没有找到可放心的接班人。

而当年“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教育，也曾在我思想中刻下深深的印象。党章上冠冕堂皇的文字，很有感召力，我很快接受这种理念，不惜背叛自己的家庭，批判父亲。党章上写：“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党除了工人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没有自己特殊的利益，党在任何时候都把群众利益放在第一位，同群众同甘共苦，保持最密切的联系，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不得谋求任何私利和特权。”（总则）共产党员“必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克己奉公，多作贡献。”“忠诚老实，言行一致。”……

我想到1930年代一些有志青年放弃大城市优越的生活、纷纷奔赴延安，是由于共产党高举抗日大旗，为最广大人民群众谋利益。家境很好的清华才女韦君宜在回忆录中写道：“我不是为了家中穷苦，反对豪富，我觉得共产党这么不顾一切苦干，看来是真的能够为人民、为祖国而牺牲一切，这是值得我一生永远跟随的。为这一点，我一切都可以牺牲。多少同学找机会奔向美国学习，我的父母愿出资送我留美，而我放弃了这一机会。”我当时的思想没有韦君宜这样的境界，但认同共产党的宗旨确实是真诚的。

时至今日，我认为共产党的“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还是好的，对的，几十年来，我还是在工作、生活中贯彻的。（下文另叙）问题是现实的政治生态中，许多党员包括一大批高级干部，早已违背了党的宗旨，反其道而行之，言行不一，心口不一。提出“为人民服务”的毛泽东，解放后，27年巡视、开会的的地方大多是武汉、长沙、广州、杭州、上海、成都、北戴河、庐山……据统计，光到杭州去了四五十次，住西湖边的汪庄、刘庄。而陕北，中共在那里待了十三年的根据地，毛泽东一次也没去过，周总理1974年陪外宾去了唯一的一次，面对更加贫穷落后的这片黄土地和父老乡亲，流了泪，想来是百感交集吧！

1957年毛在莫斯科大会上，以及与赫鲁晓夫的谈话中（据《赫鲁晓夫回忆录》），都说过类似的话：未来与美国的核战争中，中国牺牲三亿人也在所不惜。没有什么了不起。这种视数亿人命为草芥的言论，心目中还有人民吗？而且，给高级干部的各类特供商店，一直存在，89风波后，中共中央曾信誓旦旦地公开发通知宣布取消，至今依然故我。追根溯源，在延安时，就已经“衣分三色，食分五等”了。就此一斑，可见宣传教育的虚伪性和欺骗性！标榜自己是“人民的儿子”的、曾身居政治局常委高位的陈伯达，后来成了十恶不赦的“政治骗子”。自诩“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的邓小平，造成了震惊中外的六四悲剧。这些都是赤裸裸的政治欺骗！虚伪至极！

2、今天再看当年被我横加批判之言的《家言》，以及对母亲说的绝情的话，悔恨交加，百感交集。

党化教育，是不讲人性亲情的。但是人类天然的血缘关系，不是那么容易隔断的，纵然是最高领袖，也不能免俗。君不见，1959年毛泽东回韶山，不是也到富农成份的父母坟前鞠躬致意了吗？如果换成普通人，在那极左的年代，可能就会被扣上立场不坚定，剥削阶级的孝子贤孙的帽子。

最近报道，耄耋之年的资中筠老人在答《新京报》记者的提问“（此生）你最伤痛的事是什么”？她说：“对家庭，对父母很愧疚，跟他们划清界限，跟他们疏远，到最后也没能够跟他们很深地说开心话。”韦君宜晚年与女儿的谈话中说：“参加革命就准备牺牲自己的一切，但没有想到还要牺牲自己的良心。”

这真是“泣血的灵魂”。我也有同样的锥心之痛。狂热过后，开始逐渐反思。以下摘自我后来在被批判的《家言》上的留言：

形“左”实右。去其糟粕取其精华 1967·10  
深思。83—10  
幼稚无知！84—1  
苦涩的回忆，深刻的领悟，沉重的自责。84·1·28  
择其善者，铭记于心。84·1

几十年来，每当父母的忌日，我一直在笔记本上写下许多泣血的文字，表达了对父母的愧疚和纪念：

反哺未成难将寸草报春晖，江南虽好故园归去已无家。1970·9·6 痛忆  
又是一度秋。71·9·6 痛感  
人生几回伤往事。1967·9·6—1973·9·6 母亲离世六周年  
分外怀念。74·9·6  
流年似水八度秋，悲痛哀伤埋心底。75·9·6 忆八年前  
旧伤痕添新伤痕。76·9·6 痛失爱儿忆慈母殇九载  
思81·9·6 回龙山  
悠悠十五载 82·9·6  
忏悔幼稚 1983·9·6  
分明昨夜老人家慈爱入梦 83·4·5 梦父母亲  
追远之心，刻刻难忘。85·9·6 于北京电力部出国预备班  
父母之恩，永世难忘。子欲养而亲不待，痛哉！深悼母逝一十九年86·9·6 于美国匹兹堡

终生难忘的一天父去世忌日己夭亡爱儿生日 8 6 • 5 • 1 7

子欲报而亲不待，深深抱憾！8 7 • 9 • 6 海盐

痛悼母逝廿一年 8 8 • 9 • 6

思母逝廿二周年 8 9 • 9 • 6 大连

追悔是对生命的拯救 8 9 • 5 • 1 7

慈容犹绕子孙现廿三载过去如同昨日 9 0 • 9 • 6

百感交集 9 1 • 9 • 6

欲哭无泪 9 2 • 9 • 6

感念重睹母亲手缝布鞋 9 3 • 9 • 6

忍教荆树萎高枝，痛悼大哥 9 月 3 日辞世 9 4 • 9 • 6

继承发扬父母遗训 9 5 • 9 • 6

父母恩德长存心田今年清明后墓已平、碑犹存 9 6 • 9 • 6

今日是母亲仙逝 3 0 周年纪念日，因近来身体状况不太好，血压高，左侧肢体麻木，所以适当淡化哀思之情。但慈母的恩德种种长存心间。9 7 • 9 • 6 于巴基斯坦（自注：此处摘录自日记本，异于其他诸条留言，均摘自笔记本。2 0 1 7 — 0 3 — 2 3）

流年似水卅一秋 9 8 • 9 • 6

悠悠三十二年过去，酸甜苦辣俱全。母亲逝世卅二周年 9 9 • 9 • 6

继承父德（厚道）是最好的纪念 9 9 • 5 • 1 7 于韩国月城核电站

心香一瓣祭慈母 0 4 • 9 • 6

沉痾数载，出现转机。0 4 • 5 • 1 7

柳暗花明又一村 0 5 • 9 • 6

常怀感恩之心 0 6 • 9 • 6

忏悔思念感恩 0 7 • 9 • 6

忆（那年）送母去一院看病，就此没有回来。次日歿于一院急诊室走廊。不胜感伤。0 8 • 9 • 6

弘扬周氏家风，拟商谈出书事。0 8 • 5 • 1 7

奋发有为是对父母的最好纪念和报答新任中国核电工程公司调试顾问 0 9 • 5 • 1 7

追思不已 1 0 • 9 • 6

思 1 0 • 5 • 1 7

念慈母逝世 4 4 年 1 1 • 9 • 6

思 1 1 • 5 • 1 7

刻骨铭心纪念慈母 1 2 • 9 • 6

慎终追远 1 2 • 5 • 1 7 父逝纪念日

力争家族影集年内付印以纪念父母恩德 1 3 • 5 • 1 7

去京签订周家大院影集印制协议，十月份能印好，以实际行动纪念父母。1 3 • 9 • 6

悠悠 4 7 年矣！在后北岸坐三轮车送母去医院之情景宛如昨日。1 4 • 9 • 6

思念 1 4 • 5 • 1 7

追思 1 5 • 9 • 6

父逝世 5 8 年纪念 1 5 • 5 • 1 7

感恩 1 6 • 9 • 6

父逝世 5 9 年怀念 1 6 • 5 • 1 7

晨晓早醒，忆母生前二大心愿，一游京，二游杭，均未如愿。现与杭州近在咫尺……思之黯然泪下，悲从中来，痛彻心肺！

又：魂入京华（北京表姐来信，清明前夕梦见吾母）不胜感慨叹息！9 6 • 4 • 2 0

尤其令人欲哭无泪的，竟是 1 9 8 0 年代初：我所在的桓仁发电厂组织部门，通知我父亲不属资产阶级。今后家庭出身不填“资产阶级”。真是造化弄人，开了一个天大的玩笑。



一场浩劫过去，许多往事回想起来，恍如隔世。半个多世纪来，我亲身经历了许多历史事件，从1963年考上清华的天之骄子（当时全国大学一年招生30多万，同龄人能上大学只有百分之几的比例），到文革初期的革命小将，不久又沦落为“臭老九”，在艰苦的环境中接受“再教育”。后来又赶上改革开放，有了用武之地……

亲眼目睹了现代迷信的兴起和败落，看到了一个个曾经那样显赫的历史人物的兴衰沉浮，被万众祝福“永远健康”的副统帅未得善终、死于非命，被中央全会永远开除出党的前国家主席又恢复名誉，“永不翻案”的信誓旦旦只不过是一种政治策略。

从50年代“苏联的今天是我们的明天”这种牢不可破的兄弟友谊，到60年代中苏论战、珍宝岛兵戎相见，80年代又握手言和，称“双方都说了许多空话”，直到90年代苏联解体……真是斗转星移，世事沧桑。

我个人及家族也发生很大变迁。

今天重新回顾这段历史，心情十分沉重。可谓痛心疾首，悔恨交加。事实证明：当年被我粗暴批判为“大毒草”的父亲的《家言》，原来都是金玉良言，至今仍有现实的指导意义。在物欲横流，世风日下的大环境下，尤其显得珍贵。而共产主义的理想，则是遥遥无期的乌托邦。党章规定的党员标准，几乎成了一纸空文，前些年中国政坛发生的薄熙来、周永康、郭伯雄、徐才厚、令计划落马，出现一个个的利益集团，更令人深思！

周永康（北京石油学院66届）、徐才厚（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68届）都是我的同龄人，大学期间接受的政治思想教育应该是一样的，更关键的是他们都是工农子弟、红五类，“根红苗正”，是学校的依靠对象，重点培养对象。日后也果然身居高位，跻身政治局委员、常委，分别担任中央政法委主任，军委副主席，权倾一时。可是都成了大贪官，身败名裂，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而我虽然出身于需要“背叛”、“划清界限”的家庭，但在参加工作后，特别是改革开放后，我在岗位上也有送钱的，送有价证券的，都能严于律己，守住底线。不光是我，我的哥哥们也都是如此，都担任一定职务，负一定责任，有处长、局长、总经理、总工、主任等，在物欲横流、世风日下的大环境中，在种种诱惑面前，我们诸兄弟无一例外，都能奉公守法、洁身自好、没有一个假公济私，以权谋私。更没有贪污腐化，中饱私囊。甚至连制度规定应得的驻外津贴也不收。廉洁如此，近于迂腐。以我四哥为例：1980年代从上海纺织局借调到纺织部，任香港一家中资公司总经理多年，不拿在港任总经理的各种津贴补助费，直到离职，这笔钱还挂在单位财务账上。他的理由是，在上海已领了工资。众所周知，公派出国（出境）的工作人员，除了本单位照发工资外，还有一份津贴补助，这是有国家明文规定的。为什么我们兄弟能守住底线，奉公守法，我觉得与父亲的家教有极大的关系。父亲在《家言》中说：“勿存贪污之心，自堕人格”，“勿损人利己，终身要奉公守法，以身作则。”

父亲在《家言》中还教导我们：“为人作事与自己作事，务必信义，忠诚，勿可虚伪。处处须为人着想，勿自私，事以正当之业，勿损人利己，”七哥在一封来信中说：“粉碎四人帮后，幸亏我们家风好，兄弟们对己要求严格，一个个又重新成为所在单位的骨干，取得很大成绩，得到社会的承认和人们的赞扬。”我待人真诚，几十年不变，这是父母的言传身教，遗留的宝贵品质。在1965年一次座谈会上，同学评价我“对同学真诚”，2004年一位大学期间同宿舍五年半的同学到我家拜访，说我“真诚待人没有变”。

我在大学时追求进步，争取入党，已被列入发展对象，1965年底，已召开征求群众意见的座谈会，后文革开始，没有实现。经过十年文革，看到太多的虚假，思想轰毁，主观上已没有入党的愿望。后来在新单位由于工作需要，入了党，曾获“优秀共产党员”称号。1987年，在秦山核电公司，我被任命为三人监察小组成员，组长是单位纪委书记，另一位成员是总会计师。任务是清查秦山核电五十多个涉外经济合同。大背景是十三大后赵紫阳当总理，成立监察部，核工业部及下属重点单位均成立相应机构。秦山涉外合同多，是重点监察单位。纪委书记和总会计师都不谙技术，需要一名正直可靠、外语好的技术人员，参加监察小组工作，承蒙单位领导信任，把我选上，较好地完成了任务。那时我还不是党员，纪委书记建议我争取入党，今后工作方便些。我于1991年才入了党。

需要说明的是，今天反思的是当年清华政治思想工作中的党化教育，除此之外，对母校和老师给予的各种教育，包括德、智、体各方面的授业解惑，健全体魄（号召健康为祖国工作五十年），我是受益终生的。尽管当时的教育有左的成分，有那个时代的局限和欠缺，但总体来讲，还是大有教益的。饮水思源，我对母校和老师，常怀感恩之心。

蒋校长的党性和人性也是复杂的，也有两重性，比如反右时狠批袁永熙、钱伟长等肯定是错误的，但后来在招生时，也对政治条件不好的高分学生网开一面，予以录取；把九评学习的思想汇报记录和组织结论，从毕业生中的档案中撤销……都还是值得肯定的。

我在校时，周总理的俭朴和严于律己、克己奉公的形象，还有焦裕禄心中装着（兰考县）全体人民，唯独没有他自己的事迹，都深深激励过我。随着岁月流转，后来文革中又发生了很多事，近年来逐渐曝光披露，周总理在我心目中的地位已大打折扣。但文革前已病逝的焦裕禄，作为一名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县委书记，已经盖棺论定。他的精神值得学习！

毕业后，我被分配到东北一水电工地接受“再教育”，工作条件，生活环境都很艰苦，政治氛围更感压抑。我有过迷茫，有过苦闷，但没有沉沦。默默积蓄力量，巧妙地利用毛语录英文版学习外语，等待云开雾散的一天。后来被调到建好的电厂，从事技术工作，在东北艰苦生活环境中以工作为重，坚守了17年。后来考虑到读小学的女儿将来的前途，才坚决要求调离。

1985年，我作为电力部的技术骨干调到核工业部，参加秦山核电建设。我全过程参加了秦山一期、三期核电工程建设和运行，1992年、2003年分别荣获二等功和一等功。期间还参加了巴基斯坦核电站的调试工作。退休后又应聘中国核电工程公司任技术顾问多年。直到七十岁彻底告别工作生涯。亲身见证了核电事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艰难过程，为核工业第二次创业的起步和发展尽了自己的绵薄之力，感到自豪和欣慰。

结束此文时，回想起在清华求学期间对父母做过的蠢事，说过的蠢话，感到十分愧疚。对父母已永无认错的机会，因为父母早已不在了。只能在心中深刻反省，吸取教训。并在行动中加以改正和补救。

儿女对父母最好的报答，就是长大成器，对父母最好的纪念，就是牢记父母的教诲，身体力行，并发扬光大。

鸣谢：感谢胡鹏池同学对本文提出了很好的建议。

2017-06-22终稿

（作者简介：周志宏，男，1946年出生于江苏常州。1963年就读清华水利工程系。1968年底毕业，先后在辽宁桓仁水电部浑江工程局、东北电管局桓仁回龙电站、核工业部秦山核电站工作，2006年退休。）

#### ◇ 讨论帖选登

▲ 谢佑文：周志宏校友的文章写得十分真诚。他的感受无疑是发自内心的。联想当前社会是非混乱不堪的局面，我常常在想为什么这个社会还能维持和发展呢？其实道理很简单，因为绝大多数普通百姓还是跟周志宏一家人一样，受到中国传统伦理道德底线的约束。只有一小撮在权势场里作恶的极少数人他们做人的底线被所谓的政治底线取代了。这种反人民反社会的底线是反动恶势力，绝对不是代表普通人民利益的，是为一小撮中国社会中的恶势力服务的。他们心目中只有主子的命令，没有最基本的做人做事的底线。这就是为什么能揭发出有那么多恶行，贪污腐化分子能爬到如此高的地位。绝大多数普通人与一小撮口是心非的腐败分子是明显不同的。普通百姓心中的底线是中国社会必然复兴和崛起的基础。而那些口是心非的政治说教除了培养虚伪的腐败分子之外没有任何进步的意义。中国社会正在逐步回归正常生态。

▲ 侯国屏：文革后还从未见过清华官方对文革前清华政治思想工作的评价。反右展览当头一棒，九评学习变成了自揭“家丑”，可能是我心中有“鬼”，给打蔫了。还给父亲写了一封信，望他以后少给妹妹们旧思想的影响。

原罪感压抑了我许多年，直到自己有了儿子，还与妻子相约，要小心些，不要犯政治错误，让儿子背上个不好的家庭包袱。

▲ 王克斌：从周兄的成长过程看到家教和党教的竞争，亲情友情和阶级斗争的竞争。由于年轻狂热，党教暂时获胜。但人性的演变是久远的，一个有良知的人还会回归到人性的基态，放弃阶级斗争。毛的理论是骗人的，诱惑青年的，经不住历史的考验。周兄的家教是成功的，兄弟数人都在自己的岗位上为民出力，做出贡献。难得的是在纸醉金迷的今天，他们继续抱着诚信不放，一尘不染，实在可贵。从周兄的经历也看出清华学子的实干精神，努力上进，为国效劳。

▲ 张比：周志宏同学文章写得真实，发人深思。党化教育使人失去人性，彻底反思，回归人性，无论早晚。

▲ 吕述祖：志宏兄的文章朴实无华，又回归到了党性，人性的讨论。杨超学长曾提出：“党性+人性=常数”的公式，精辟！

毛曾经说邓这个人党性很强，从反右和8964来看，毛的确看人很准。

1949年以来，中国的教育逐渐纳入了党化教育的轨道，有政治课，教你要从小就要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却从来不教你如何做人，不教你一个人首先要诚实，善良，正直。这些做人的基本原则就只能拜托于家教。直至今日，中国仍然是以政治化的标准来判断一个人的“好和坏”，这和百姓心里的标准往往大相径庭。在这个社会里，小人之所以容易得志也在于一个人只要党性强，人品是无所谓的。现在，中共党内已经见不到君子，因为这些人都不会有很强的党性。

民国乃至现在的台湾都还有一个“公民”课，教你如何做一个社会人，咱们没有。只要热爱党就可以了。

我们仍然在走着一条背离普世价值的路，与世界的进步潮流越来越远，想到这儿，不免心痛！

▲ 孙毓星：志宏兄的文章素来情感真挚、朴实无华。本篇讲述的那段历史和心路，我特别感到真实亲切，或许因我们的出身经历颇有相似之处。当年处心积虑地批判家庭，努力“追求进步”，历史的重演就像祥林嫂给庙堂捐门槛一样可笑、可悲。

读到志宏对父亲《家言》的批判犹为动容，因为我的父亲亦早逝（1960年），虽未留下这样的文字，但有同样的言传身教。《家言》传承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已成为我们这一代的“底色”。感谢老一辈传给我们的底色，帮助我们在迷惘中思考，在挫折时奋起，在成功时谦逊，经过人生歧途坦途的不断寻觅，终于达到人性的回归。

应该承认，当年清华的思想教育在“争夺青年一代”方面是颇有成效的，作为一代佼佼者都站到了党的一边。如今已进入信息时代，“底色”也变得丰富多彩了。社会肯定在进步，但我们老一辈人对“底色”的担忧是不是杞人忧天呢？

▲ 周志宏：孙毓星兄：我们有类似的感受。先父从小家境贫寒，学徒出身，没念多少书，但早年上过几天私塾。估计看过“弟子规”，“增广贤文”等启蒙读物，所以他在《家言》中，有的引用了原文，有的根据自己的理解和体悟作了引申和发挥。先父的家训与优秀的传统文化是一脉相承的。文革初期，我被当时的宣传所蛊惑，不自量力地对家训横加批判。从我不同时期的留言看，一年后就有些觉醒，更晚些时候（八十年代），就用来指导自己的行动了。如“勿自私，勿损人利己”，“终身要奉公守法，勿存贪污之心，自堕人格”等等。时间和历史作出了公正的评判。孰是孰非一目了然。

▲ 李友才：读周志宏文有感：

党性奴性育心魔，泯尔人性进铁笼。周兄诚供活化石，长叫后人细揣摩。

我是穿着母亲缝制的土布鞋进清华的。同时我穿的裤子也是母亲织的土布，当时我还送过一位同学穿。我父母也有简单明确家教，他们几近文盲，我家与周兄家比较似缺少了点书香。但他的文章引起我强烈的共鸣。许多细节有惊人的相似。

▲ 孙怒涛：李友才：我也如此。衣裤都是母亲家织的，鞋袜都是母亲手做的。没有家训。父母的言传身教和淳朴的民风乡俗奠定了我的底色。而政治思想教育就是为了把底色染黑。

▲ 郑春湖：周志宏的家教历经文革大劫难而屹立不倒，顽强生存下来，传给了周志宏这一代，才出现了周志宏。这是中华传统道德深入植根于中华民族头脑血脉的有力证明。阶级斗争理论祸害中华一个世纪，终于被停止下来，但余毒远远未消，将中华传统道德去其糟粕，光大优良与批判阶级斗争理论结合起来，以及借鉴学习普世价值中的人文理念，中国的政治改革才有可能真正推行起来。

▲ 陈中平：周文平直朴实，反映了他内心的真实感受。周父生活在动荡离乱年代，而能秉承为人处世的基本原则，传至后人，教子有方。他的母亲含辛茹苦，把幺仔抚养成人。而周氏昆仲恪守父训，个个成才，尤其不忘做人的根本，这是十分难能可贵的。值得我们大家学习。

这样成功的范例，似乎比那些虎爸狼妈强多了。

中国历来的家教，有许多优秀的传统（当然也有不少糟粕）。而且并不局限于士大夫家庭。上海开埠的传奇人物，如叶澄衷等，也是诚信起家的。所以无论出身贫富，良好的思想教育，具有潜移默化的作用，全靠受教者的领悟与坚守。

解放以后，中国社会发生天翻地覆的改变。家族的禁锢被彻底打破，而许多优秀的祖训，也成为垃圾扫地出门。中国的社会发生了彻底的“解构”，产生了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单位”和“组织”。宏大叙事成为主旋律，假大空也得以流行。

▲ 叶志江：周兄的《家言》一文让我知道了，他之所以一生正道，与人为善，和他父亲的正直善良、身教言教分不开的。我们的青年时代曾经被扭曲，周兄披露的他的心路历程，对于我们的后代理解我们这一代人的思想转变是很有意义的。

▲ 张从：志宏兄曾赠我金秋随感和周氏家族纪念册，读后感慨万端。良好的家风对一个人的成长是有极其重要作用的，志宏兄就是一个典型，他从水电转为核电，成为专家，是我们群里最后退休的。其人朴实，其文无华。其良好家风应世代流传。文革前大搞阶级斗争，大批阶级烙印和人性论，给我们和家庭都造成创伤。如年轻人大都个性开放，忽视传统教育。志宏之文如提供给下一代作为教材，则功莫大焉。

▲ 王铁藩：做人最贵在人格。听过周志宏发自内心的声音，免不得感慨万端，这是一曲从假大空回归真善美的游子吟。如此沁人心脾的教诲，出自一位工商业者（算民族资产阶级吧）；真正地令那些无产阶级革命家汗颜，也包括咱那位蒋校长。

说到家教，我刻骨铭心的就是家母那句“男儿膝下有黄金”的教诲。我两岁即逢日寇入侵，家父往云南边陲修筑滇缅公路，家母独自带领我与家兄生活在四川。虽举目无亲生活拮据，家母处处事事都要求我们哥俩矜持待人，即无馋像，无窘态，不嬉闹，尊礼节。一次我们几个男生课间淘气，老师要我们跪在操场上以示惩戒。家兄回家禀告家母。家母当即来到学校，将我们一一拉起，并质问前来的校长说，男儿膝下有黄金你们知道不。校长说，这是我们的校规。家母反驳说，学校是造就人才的地方，人没有了人格，谈何人才。此事闹到县里的督学处。督学从善如流，县里很快废止了包括罚跪在内的体罚。后来督学来家拜访，与家母说话间，方知督学与家母竟是河北保定女师的校友。

斗转星移，到了1957年，我在清华因“两报一刊”摊上了大事儿。家父告诫我与家兄说，你们的言行只有对得起党和人民才能对得起父母，新社会忠孝是统一的；并要我忍辱含垢。家母事后对我说，你父亲公职在身，说了就说了。但你得记住，有错才认错，有什么错认什么错；还是那句老话：男儿膝下有黄金，只跪上苍与双亲。又过了多少年，前些天，林贤光老师问我，怎么把你处理得这么重（保留学籍监督劳动）？我无以回答。早在1978年右派改正时，学校邀请当时班级代表开会。反右骨干们一致认定不给我改正，理由是，他从来就没有承认反党反社会主义，态度极其恶劣。与会的另外一些同学说，这不就得了，正因为人家没有反党反社会主义，才必须予以改正！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原来的班（暖59）开始邀我参加聚会。耳边常听到不无遗憾的说法，你真够一根筋的，当时但凡服个软，也就是个“中右”；咱们还能一块堆儿毕业。有人还举例说，当时人家潘丽华（时任给暖专业四个班的党支部书记，后曾任全国学联主席）要你别离开清华园（57年暑期）是怕你出意外；你可好，回人家一句“干嘛，画地为牢？”随后照旧天天去颐和园扑腾（游泳）！有时想来也是，干嘛这么较劲？可是屈打成招这类事儿就是做不来——还是那句老话：男儿膝下有黄金。要做人，人格最重要。

▲ 林海：人的生命，有个体生命和群体生命两种形式，群体存在于个体之中。所谓人性，就是维持生命的一种本能。

食是维持个体生命的必要条件，性是维持群体生命的必要条件。食与性，构成了人性的基础。

人性在个体与群体之间，要取得平衡。群体内的个体之间的爱，是人性的重要内容。群体应当对个体的权益保持尊重，个体应当对群体的权益做出奉献。这两方面都是人性的表现。

对于人类的生命史来说，所谓的党性，是何其短暂，何其渺小，何其微不足道。

▲ 郑春湖：中国最早的人性论源自商末周初出现的“宗法”，周公旦制定周礼，周礼精髓在“亲亲”、“尊尊”。孔子的道德学说以“仁”为中心，将礼义智勇信联系起来成为一个

规范整体。孟子着重发展了孔子“仁”的学说，孟子仁政“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全世界最早的“以人为本”思想。宋朝程颐新儒学经朱熹发扬光大，形成完整的系统的道学理论，建立完善的教育体系，对中华民族独特品格和文化的最终形成有巨大深远影响，成为官方正统，科考依据，从而将以儒家仁爱为中心的忠孝节义礼智信廉耻伦理观念以及做人 为官的品德植根于读书人的头脑血脉，再以之教化黎民百姓，中国人世代传承，形成中华民族温良恭俭让和勤劳诚正直的特质。可惜在辛亥革命后被否定，新中国大力摧残，文革登峰造极，如今再想恢复中华传统人性，难！

▲ 王普：郑春湖：早期的孔孟在人性的基础上还提出了初步的民本、民主思想，后来被皇家删除阉割了许多。现在的孔子学院基本是太监学说了。

▲ 吴学民：北京市委宣传部下属千龙网批任志强“简直就是党性的泯灭、人性的猖狂”。某法院贴出“讲党性不讲人性”的标语。说明党性与人性的关系还是没有在社会上得到共识。周志宏用自己的切身体会，表明正是曾被自己用“党性”与之划清界线的闪耀着“人性”光辉的父亲的遗言成为他们兄弟几人宝贵的精神财富。

一个政党，如果处于夺取政权的秘密活动阶段，强调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的一致性，即党性，是有必要的。但作为一个领导全民的唯一的执政党，只有唯一的事情要考虑，那就是全民的福祉。除此以外，还有什么党的特殊利益呢？还有什么东西要高于人性呢？

▲ 汪晓光：吴学民：同意你的观点，党性在一定阶段，一定时期还是需要的。但在建设和和谐社会时期应该突出人性，强调以人为本。但是党员还是党性第一，否则就别入党。

▲ 陈长坤：解放后共产党将一切传统文化都视为封建的、腐朽的文化，扫进垃圾堆。学校进行的是党化教育。有一首歌说的好：唱只山歌给党听，我把党来比母亲；母亲只生了我的身，党的光辉照我心。旧社会鞭子抽我身，母亲只会泪淋淋；共产党号召我闹革命，夺过鞭子抽敌人。所以，党的教育就培养了一大批的打手啊！

▲ 侯国屏：党性是人性的一种异化。人一开思考，人性就开始异化了。

现在所说的人性是对党性的反动，一种意识后的返璞归真。

今天，资本家都可以入党了，党性是什么？党性就是派性，组织性。与阶级无关。

▲ 吕述祖：侯国屏：同意你认为党性已经是一种派性的说法。一个人应该永远以人性为第一位的考量，哪怕你是一个党员。以人为本是对良知的认同。为了一党的利益，为了党国的江山，可以泯灭人性就是一种反动。

▲ 谢佑文：吕述祖：如果国共两党当初多一点人性，少一点党性，中国百姓可以少受多少罪。49年后大陆干部多一点人性，60年代初不至于会饿死三千万基层百姓。文化革命期间也不至于残杀千百万无辜百姓！！

▲ 陆元吉：瞿秋白的一生或可为党性和人性的冲突作一注解。

▲ 吴学民：党同伐异，这就有政党的产生。所以党性都是为了对付异己用的。在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要消灭阶级敌人，就不会顾及阶级敌人的人权，也就与人性往往会有冲突。所以关键还是意识形态的问题。现在抛弃了阶级斗争的思维，并且通过江的“三个代表理论”，实际上演变成全民的党。但由于权力来源问题没有得到解决，总觉得还有许多“敌对势力”在觊觎权力，所以还要强调党性。这往往也会与法治与人性产生矛盾。在民主国家，

政党也会有党性，但不会把其他党派当作不共戴天的敌人，他们的党性与人性就不会有什么抵触。

▲ 周家琮：党和党不同，胡适先生早就说过，政党分两类。现代意义的政党不存在所谓党性，也没有那么多“忠诚”，“规矩”。只有革命党，才依赖由帮规或极端教规承袭而来的党性维系组织。

革命党向合格执政党的成功转变，以党性寿终正寝为标志。“四个现代化”也好、治理现代化也好，前提首先是执政党的现代化。

▲ 范力：党性与人性之和等于一，这个公式很有道理，但是不完全对。共产党内有很多人，党性强，人性也好，并不矛盾。共产党的党性，从理论上讲是包含着人性善良和高尚的因素，二者是相容的，某些方面党性甚至高于人性。这是中国革命胜利的重要原因。但是发生方向路线政策错误时，党性排斥人性，释放人的兽性，造成一系列罪行和悲剧。那些以党性反对人性的高官，其实没有人性，也没有党性。

长期以来，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宗旨一致，相辅相成，促进中华民族几千年的传承繁衍。49年后，社会教育掺入狼奶和谎言，家庭教育的作用突显。看了周志宏学长的文章，最突出的感触是，《家言》、《傅雷家书》，是家庭的圣经，将永世流传。

▲ 王克斌：资产阶级政党的概念与列宁和毛党有本质的区别，因此，从党性中找不到人性。1949年后，人性道义受到前所未有的压制。即所谓的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即使饿死几千万人，即使几十万人因为毛的一句话死在朝鲜。这个党和这个制度带来了中国的今天。从镇反、文革到贪官遍野，一条黑线贯穿了党的真实历史。这个党实际是皇帝党。从家天下到党天下，又回到家天下。皇帝从一人变成多人，国家从一姓变为多姓。

▲ 李子壮：党性是刘少奇的发明。见于《论党》《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定义是阶级性，实际是纪律性。和毛无关，和派性等价。毛1974年说邓是“政治上强”，是指邓能抓住大事。把党性和人民性一块拉，是胡绩伟干的事。批人性论是姚文元的信，不要找错人。

阎淮：党性是什么，你最有发言权。因为你是组织部的，专管党性。实际操作中，就是“宁犯政治错误，不犯组织错误”毛在8届10中全会上把陈云和邓子恢区别，就是这一条。毛打高饶、彭黄等，也是这条，非组织活动。因此，党性就是组织纪律性，和人性人民性很本不搭界。扯到一起，就是关公战秦琼。

▲ 吕述祖：李子壮：党性不是什么人的发明，是反人性本质所决定的。

▲ 李子壮：吕述祖：人性相对的是兽性，党性相对的是派性，不是一组。

▲ 阎淮：李子壮：在广义的动物界，人性相对兽性。在社会领域，人性相对阶级性，无产阶级性即党性。

▲ 李子壮：服从毛就是党性，不服从就是“有反骨”。

▲ 徐耀寰：人类社会的一切问题归根结底都是人的问题，一切人的问题归根结底都是人性的问题。一切想进行社会改革的人必须对人性有彻底而正确的了解，否则无异缘木求鱼。卡尔和卡尔教就是栽在了把人性的问题误判为阶级性的问题。对于人性的问题是基督教信仰彻底做了正确的阐述。

□ 原载：《真话与忏悔——文革 50 周年清华校友讨论集》，孙怒涛主编，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2018 年 5 月

---

|         |             |          |
|---------|-------------|----------|
| 本期编辑：   |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 《CND》总编： |
| 华新民（美国） | 思语（美国）      | 陈天寒（美国）  |

《华夏文摘》网址：<http://www.cnd.org/>，国际刊号 ISSN 1021-8602  
投稿专用地址：[tougao@cnd.org](mailto:tougao@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mailto:cnd-cm@cnd.org)

---